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与我国经济建设实践

何 寿 枢

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占有重要的地位。今天，它仍是我们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矛盾必然进一步发展的锐利武器。同时，由于它也揭示了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的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因而只要去掉它的资本主义外衣，对社会主义经济也是适用的，它是社会主义社会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与失误、经验与教训，都证明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正确性。当前，我国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还在继续进行，深刻理解和掌握社会再生产的理论更具有现实意义。《资本论》中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内容极为丰富，本文拟根据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仅就我国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中应当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试作一剖析。

第一，正确处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考察社会资本再生产，是从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入手的。只有当社会总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不仅在价值上得到补偿，而且在实物上也得到替换以后，社会再生产才能继续正常进行。为此，马克思还提出了正确解决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的两个基本理论前提：第一，按照实物形态，把社会总产品，从而社会的总生产，分成两大部类，第Ⅰ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第Ⅱ部类是消费资料的生产。第二，社会总产品的价值都由不变资本价值（c）、可变资本价值（v）、剩余价值（m）三个部分组成。由此出发，才能顺利地解决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

马克思指出，在简单再生产时，总产品实现的基本条件是 $I(v+m) = IIc$ ，即第Ⅰ部类的可变资本加剩余价值等于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在扩大再生产时，总产品实现的基本条件是 $I(v+m) > IIc$ ，这是以不等式表示出来的平衡条件式。这样第Ⅰ部类才可能为两大部类扩大生产提供所需的追加的生产资料。但决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理解第Ⅰ部类的这种作用。正如马克思说：“就像第Ⅰ部类必须用它的剩余产品为第Ⅱ部类提供追加的不变资本一样，第Ⅱ部类也要在这个意义上为第Ⅰ部类提供追加的可变资本。”（《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4页。以下同书只注明页数）这就是说扩大生产不仅要有追加的生产资料，还要有追加的生活资料。可见，第Ⅰ部类的发展又必须依赖于第Ⅱ部类也有相应的发展。只有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都按上述条件相应地发展了，社会再生产才能以扩大的规模进行。总之，社会总产品无论在简单再生产时还是在扩大再生产时，它们的实现条件都表明两大部类之间以及各部类内部的分部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它们之间是互相提出需要，互相提供满足需要的产品，互为市场，互为条件，互相制约的。社会生产只有遵守这些比例关系，总产品才能实现，再生产才能进行。所以，正确处理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使之保持平衡、协调发展，这是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的基本条件。没有这种比例关系，就没有生产的正常进

行和增长速度。

但是，以往我们的经济工作存在着“左”倾错误，盲目地追求高速度、片面地理解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搞钢铁孤军突出，结果导致了两大部类比例失调，农轻重的比例极不合理，经济结构畸形，大大降低了生产和建设的经济效益，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为此，三中全会端正了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提出了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调整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把国民经济搞得比较比例。鉴于农业、轻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状况，而重工业内部又比例失调，能源、交通成为突出的薄弱环节。因此放慢重工业的速度，加强农业、轻工业和能源、交通事业的发展，把消费品生产放在重要地位，则是完全必要的。只有如此，我国经济才能稳步前进，健康发展。

两大部类之间必须保持平衡的原理和以往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启示我们，应当正确处理速度、比例、效益之间的关系。经济效益就是指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劳动消耗（包括劳动过程中占用的物化劳动和生产产品时实际消耗掉的劳动量）同劳动成果的比较。因此经济效益的大小，是同经济活动中所取得的劳动成果成正比，而同所消耗的劳动量成反比，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要提高经济效益就必须减少劳动消耗。无论是活劳动还是物化劳动的减少都可归结为劳动时间的节约。“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5页）可见提高经济效益十分重要。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怎样评价和求得最优经济效益呢？马克思讲：“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68页）。这个论述说明，评价全社会经济效益的标准应当是，一定时期社会拥有的总劳动量中，各种不同性质的劳动量所生产出来的各种不同用途的产品数量，刚好与有支付能力的各种不同的社会需要量相等。简单讲就是以生产出来的各种产品能否满足各种不同的社会需要为标准，即社会需要与有用效果的比较。因此，在节约时间的前提下，根据社会需要按比例在各生产部门之间分配社会劳动，从而生产出能与社会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的这种比例，就是最优的比例。而这种最优比例正是求得最优经济效益的保证条件。以上分析说明，效益制约着比例，从而也制约着速度。保证效益的比例是最优比例，在这种比例基础上所能实现的速度是最优速度。当然，如果没有一定的速度，产品满足不了社会需要量，效益也会受到限制。但讲求效益是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比例是保证条件，速度是讲求效益的必然结果。因此，今后必须把速度与效益统一起来，以社会经济效益的大小来衡量发展速度是否恰当，把经济工作转移到以提高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不能再搞不切实际的高速度、高指标了。

社会主义制度下提高经济效益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此提供了优越的社会条件。马克思说：“时间经济以及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于不同生产部门，仍然是以集体为基础的社会首要的经济规律。甚至可以说这是程度极高的规律。”（《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一分册，第112页）社会主义制度下提高经济效益，就是要以尽量少的劳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这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所要求的。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作用以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不仅为提高个别企业、个别部门的经济效益，而且为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提供了可靠条件。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比拟的。现在强调提高效益，不是不要速度。我国的经济建设不能没有速度，但不能离开效益和比例就说速度越高越好。我国的社会制度的确

有着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速度来发展国民经济的可能性，也有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许多条件。而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制定出能反映、符合社会需要的计划，搞好综合平衡，首先是两大部类的平衡。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并以一定的速度发展。这种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有比例保证而增长的速度，才是有用的、扎实的、因而也是最优的速度。总之，正确处理好比例关系，首先是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既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条件，又是我国经济能以较快速度发展的保证。

第二，正确处理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

关于再生产的类型，是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原理之一。马克思按再生产的规模，把社会再生产区分为在原有规模上重复进行的简单再生产和不断扩大原有规模的扩大再生产。

扩大再生产是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特征。这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必须靠持续地扩大生产规模，使生产逐年有所增长才能实现。因此，我国的经济建设，必须每年把一部分剩余产品用于积累以扩大生产，这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告诉我们，要使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必须首先保证简单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决不能因扩大再生产是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特征而忽视简单再生产。正如马克思说的，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一个现实因素”（第438页）。理由之一，“简单再生产是每个规模扩大的年再生产的一部分，并且还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第457页）。这就是说凡有扩大再生产的地方，简单再生产是包含在规模扩大了再生产这一总体之中的，并构成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简单再生产总是最大、最重要的主体部分，而再生产的扩大部分所占的比重总是比较小的。可见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理由之二，“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是在简单再生产内部生产出来的。”（第560页）这就是说，生产建设规模能否扩大，剩余产品能否转化的生产资金，要靠原有生产能否为扩大生产提供所需要追加的生产资料和追加的生活资料。可见简单再生产又是扩大再生产的前提和出发点。

因此，要使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必须处理好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即处理好扩大再生产总体中属于原有规模的部分与新扩大了规模的部分的关系。在实际生活中，也就是要处理好生产和建设的关系。在处理二者的关系上，必须坚持先简单再生产后扩大再生产，“先生产，后基建”的原则。在作计划时先安排好当年的生产，即先保证和满足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然后再根据剩余产品的多少和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情况，去进行新建或扩建。但是，我们过去往往重基建，轻生产甚至不顾及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凭主观愿望安排扩大再生产的规模，盲目地重复地上了一些新项目、铺新摊子，其结果不仅损害了当前的生产，就是一些上了马的基建项目也不得不退下来。当前，调整工作正在继续进行，就应以马克思的理论作指导，吸取过去的教训，先维持好简单再生产的规模和能力，然后按量力而行的原则，针对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有重点地进行扩建和新建，严格控制基建项目。只有这样，我国的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

如何使用折旧基金，是关系到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能否得到正确处理的又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在考察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时，是假定固定资本的价值在一年中一次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并在当年的社会总产品中得到了补偿的。但事实上固定资本的价值是随着它的磨损程度逐步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为了保证简单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必须把这部分资本价值从商品的销售收入中取出和积累起来，以备将来用于固定资本更新。于是在整个固

定资本平均有效使用年限未到从而不需要全部更新固定资本以前，就形成了一笔货币准备金，即折旧基金。不难看出，提取折旧基金是“以便在资本需要以实物形式进行再生产时来补偿资本。”（第192页）这样，马克思就阐明了折旧基金的补偿性质及用途。从根本上讲，折旧基金是用来补偿已经消耗掉的劳动资料的价值，即用来重新购置需要更新的厂房、机器、设备的，所以它的提取和使用是属于简单再生产的范围。马克思同时还指出，在整个固定资本更新未到来之前，可以把已经提取的折旧费暂时用于扩大再生产。但他强调这种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不是由积累即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引起的。可见，必须根据马克思的论述，用好折旧基金，才能处理好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

以往，我们忽视简单再生产，折旧基金被过多地挪用于扩大建设规模，以致原有企业需要替换的设备得不到及时更新，生产能力萎缩。这种吃老本的办法既然损害了简单再生产这个基础，就难于达到扩大生产规模的目的。因此，必须从理论上明确折旧基金的补偿性质，并确定它被挪用于扩大生产规模的界限。这种界限是：首先要充分保证当年必须更新的固定资产能得到及时更新，其次是要充分保证原有设备正常运转的维修费用，余下的才可用于扩大生产规模。

第三，正确处理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关系。

在再生产类型问题上，马克思还按实现方式的不同把扩大再生产区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他说：“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含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第356页）他还说：“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第192页）可见，不是按有无积累，而是按生产要素（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质和量的变化情况，即按有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为标准，来区分外延扩大和内涵扩大的。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是单纯依靠生产要素的数量以同等比例增加来扩大生产规模的，这里没有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质的变化，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而它是以生产向延广方面发展为特征。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是依靠技术进步，依靠生产要素质量的改善，依靠提高活劳动和生产资料的效率来扩大生产规模的，因而它是以生产向深度进军为特征。

扩大再生产的这两种类型常常结合在一起，并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一般地说，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时，扩大再生产以外延型为主；当生产力有所发展时，内涵型的因素就逐渐增加。在生产增长的因素中，增加生产中的劳动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两个重要因素。所以当机器大工业出现为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提供了物质条件时，劳动生产率对生产增长的作用就开始超过增加劳动量对生产增长的作用，从而社会扩大再生产中内涵的因素就开始超过外延的因素而占居主要地位，外延的因素相应退居次要地位。一个国家在奠定了大工业的物质基础后，就有可能实现以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社会主义制度清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障碍，不仅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而且这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手段。因此就社会制度的性质讲，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更应该采取以内涵为主的形式。

正确选择扩大再生产的类型，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处理好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关系，这对于我国经济建设能否顺利发展十分重要。由于旧中国的经济遗产十分落后，所以建国初期我们主要采取外延扩大再生产形式是完全必要的，并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

果。问题是工业化基础奠定后，我们未及时由外延型为主转向内涵型为主来扩大生产，反而一味追求高指标，走一条“重基建轻生产、高积累低消费”的路子，热衷于搞新建，造成战线过长，大量人财物力被占用和浪费，未能形成有效的生产能力。同时，我们也没有充分利用现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忽视维持它们进行简单再生产的能力，致使老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消耗高，质量低。加上管理体制的弊病，使产销脱节，造成大量积压。生产经营的这种落后局面，使原材料和能源供应更加紧张，迫使再去大搞建设，其结果加剧了比例失调和经济结构畸形。这种靠高积累来支持的以外延型为主的扩大生产的路子，表面看速度不算慢，但真正创造的社会财富不多，经济效益低，人民得到的实惠少，经济发展也不稳定。现在，我国建设方针上要有一个根本转变，即扩大生产主要靠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也就是由外延型为主转到以内涵型为主，这就是“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的原则。现在我国工业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又有一支科技队伍，为实现这一转移提供了条件。当然这并不是一概排斥外延扩大再生产，在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尤其是能源、交通两个战略重点，还必须新建一些项目，才能搞活国民经济的全局。同时缺资金、缺设备而劳动资源又十分丰富的状况短期内不会改变，故应扬长避短，在条件允许下搞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商业服务业以及文教卫生事业。这对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以及解决就业问题都有重要意义。

依靠现有企业实现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一是要抓挖潜，二是要进行技术改造。为此，要打破那种认为不增投资就不能增产的偏见。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本具有潜力的论述是值得我们认真领会的。他在《资本论》中详细地论证了在不增加货币资本的情况下，依靠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或提高劳动强度但不增加劳动报酬；加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更有效地利用劳动资料；充分利用不费分文的自然力；改善劳动组织和提高工人的劳动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相同时间里生产更多的产品和转移更多的生产资料价值，从而为扩大生产提供更多的物质条件；依靠资本集中出现了大企业从而促进了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以及加速资本周转等八种途径，都能扩大资本执行职能的范围，从而扩大生产的规模（见第393—395页）。我们应从这些论述中得到启示，并注意在各个环节挖掘企业的潜力来实现内涵扩大再生产。当然也要看到，挖潜如果不与技术改造相结合就有局限性。如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建立了各种责任制后就不能超过合理的界线去延长工作时间或提高劳动强度；又如要加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而不与科学技术结合不仅收效不大，甚至还会破坏生态平衡。所以挖潜要与技术改造相结合而且一般还应以后者为主，才能充分发挥现有企业潜力并使它增加进行内涵扩大的能力。改造现有企业带有部分简单再生产的性质，确有一部分系补偿原有设备和维修现有设备，但相当部分的性质不是这样，因为通过技术改造，提高了生产资料特别是提高了设备的效率，从而增加了产量，提高了质量，达到了内涵扩大生产的目的。改造现有企业也带有部分外延扩大的原素，如进行技术改造大多数情况下总要增加投资和设备，但不是以同等比例增人增资，而是主要用来改善、提高生产资料的效率，增加了内涵扩大的因素。由此可见，“挖、革、改”是内涵型与外延型结合而以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形式。它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也正是这样，据有关统计，它一般比新建企业节约投资三分之二，节约设备、材料百分之六十，缩短时间一半以上。这一事实从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要防止另一种偏向，即挖潜总得与技改相结合，总得要增添一点投资和设备，如果不是这样，只挖不补，竭泽而渔，长此下去简单再生产就很难维持，更谈不上实现内涵的扩大了。这点在理论上必须明确。

依靠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以实现内涵的扩大再生产，这就要正确对待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问题。列宁在阐述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实现的条件时，依据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把技术进步纳入公式，得出了“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得更快”的结论（《列宁全集》第1卷第72页）。这并不排除特殊情况下，如第Ⅰ部类已能满足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对生产资料的需要，而消费资料却大大落后于两大部类扩大生产的需要时，消费资料就可以比生产资料增长快些。但这种特定情况并不能否定生产资料增长较快的客观必然性。因此应该看到，随着我国技术改造工作有重点有步骤的逐步展开，将会出现生产资料比消费资料增长较快的趋势，但不能由于过去片面强调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曾带来过不良后果，就因噎废食而否定这种客观必然性。当然，我们应慎重地对待这个问题以免重犯错误。首先必须明确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决不能脱离消费资料的相应增长。因为第Ⅰ部类要扩大生产，不仅需要追加的生产资料，也需要追加的生活资料，否则，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继续进行。这个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也包括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时的扩大再生产在内。其次，需要强调的是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归根到底又是为了满足第Ⅱ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要，如果第Ⅱ部类没有适当的发展，则第Ⅰ部类就会有一部分产品不能实现，这样它的优先增长也就失去意义。正如列宁说：“生产消费（生产资料的消费），归根到底总是同个人消费联系着，总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列宁全集》第4卷，第44页）这是我们要调整重工业服务方向的理论根据。重工业的发展，虽然其中有一部分是为自己，但不能仅仅如此，它必须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服务才有出路。只有这样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才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第四，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告诉我们，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源泉，也是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社会总产品在扣除补偿消耗了的生产资料部分后，剩下的是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新价值，即国民收入。社会主义国民收入按其最终用途形成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积累基金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消费基金主要用于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而扩大生产的最终目的又是满足人民的需要，因此从根本上讲积累和消费是统一的。但另一方面又有矛盾，如国民收入已定，积累的比重过大消费部分就少，反之亦然。处理不当都会影响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可见积累与消费是重要的战略比例关系。

这里，关键在于确定符合我国情况的合理的积累率。“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是指导我国经济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也应如此，人民生活要首先考虑，但国家建设也要，二者必须兼顾。过去的主要问题是积累率偏高，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影响了劳动积极性。这种情况经过近几年的调整已有了很大改变。当前，也要防止片面强调改善生活而忽视国家积累的倾向，否则也不利于生产的发展。

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还包括合理分配积累基金和提高它的使用效果的问题。积累的规模，特别是积累基金的使用方向和构成，直接影响着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各个生产部门的发展比例。加之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民生活水平低，这种状况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所创造的国民收入，除了用于满足十亿人口的基本生活消费外，可用于积累部分的相当有限，这决定扩大生产的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为此，怎样把有限的积累基金合理地加以利用，选择正确的投资方向，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马克思说：“有些事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而另一些生产部

门不仅在一年间不断地或者多次地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公有的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

(第396—397页)这就是说，我们在制订经济计划时，必须处理好远期计划与近期计划的关系，必须根据各个生产部门不同性质所决定的周转时间长短等情况，确定正确的投资方向和合理的基本建设规模，搞好综合平衡，这样才能既使当年生产正常进行，又能使远期计划顺利完成。所以，要适当调整过去投资于重工业多而轻工业少，重工业中投资于钢铁、加工工业多而能源、交通业少，投资于生产领域多而非生产领域少等不合理状况，并适当增加对教育、科技方面的投资，这是实现四化的需要。当务之急，是要集中资金确保能源、交通这两个战略重点的建设，以适应和满足整个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的发展。在投资方向和规模已定后，还要注意提高积累基金的使用效果，才可以相应地减少投资。只有克服过去浪费大、效果差的状况，才能争取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努力提高投资的经济效果。

斯大林说得对，“虽然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规律，但他决不认为他的再生产理论仅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才是有效的。恰恰相反，他显然认为他的再生产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生产也会是有效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61年版，第65页)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再次证实了这一论断。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内容极其丰富，除本文提及的外，还有许多基本原理值得我们结合实际去学习和研究。当前我国的经济建设正在调整、改革中前进，还有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急待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应有的贡献，也必然会给马克思主义增添新的内容。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仍将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指南，它永远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简 讯

七省区八院校政治专业函授教材讨论会在我院举行

黑龙江、辽宁、河南、浙江、广东、广西和四川七省区的八所高等师范院校政治专业函授教材讨论会，于一九八三年一月十日至二十日在我院举行。

来自华南师大、广东教育学院、哈尔滨师大、辽宁师院、广西师院、河南师大、浙江师院和四川师院八所院校的四十五名政治理论课教师以及函授部门的负责同志，对《高等师范院校政治专业函授教材》(初稿)的科学性、系统性、知识性问题和教材的编写体例等进行了深入讨论。

《高等师范院校政治专业函授教材》，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四门课程。与会同志认为，要针对这套教材的主要读者对象是中学政治课教师的特点，在修定中努力使教材内容紧密联系中学政治课教学实际，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阐述，反映出八十年代理论研究的新水平，使它具备知识准确，科学性强，通俗易懂，适于自学的特点。并争取早日出版，满足广大政治专业函授学员的迫切需要。(邓奎金)